

# 从《海日楼题跋》看沈曾植的碑帖收藏

逢淑美<sup>a</sup> 杨刚<sup>b1</sup>

(嘉兴学院:a. 图书馆;b. 设计学院 浙江嘉兴 314001)

**【摘要】:**清末民初收藏之风盛行,金石、碑帖、书札、图籍无不成为藏家的插架之物,嘉兴沈曾植便是这一时期较具代表性的碑帖藏家。沈氏精通文史,长于考据,书法卓绝,其鉴、其藏往往金薤琳琅,其跋、其论大多鞭辟入里。通过对《海日楼题跋》等文献的梳理可知,沈曾植碑帖度藏有三大来源:承袭家传、收罗购求和友人馈赠,他对金石碑帖的收藏并非简单的占有,对碑版、法帖、墨迹多有考证、校勘、辨伪、评鹭。在收藏过程中,沈氏还与许多碑帖藏家交往过密,在这一过程中开拓了艺术眼界,提升了赏鉴能力,其藏品在文化、文献、艺术等方面都有重要价值。

**【关键词】:**《海日楼题跋》 沈曾植 碑帖 收藏

**【中图分类号】:**J292.2 **【文献标志码】:**A **【文章编号】:**1671-3079(2020)04-0028-06

在北宋、清康乾、晚清至民国初的三次全国性收藏热潮中,碑帖收藏一直名列前茅,文人雅士对之追逐不舍。沈曾植的金石碑拓收藏是清代文人金石文献收藏、考据、赏鉴、题跋活动的典型缩影,代表了清末民初嘉兴及周边地区金石收藏、考据与题跋文化的最高水平,带动了清末民初杭嘉湖地区乃至长三角地区金石碑帖的收藏,是清末文坛、艺坛收藏活动繁荣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,掀起了民国嘉兴及周边地区文人碑帖收藏的风潮。

沈曾植(1850-1922),字子培,号巽斋,浙江嘉兴人,博古通今,学贯中西,以“硕学通儒”蜚声中外,是清末陈衍、郑孝胥所标榜的“同光体”诗人的魁杰。在诗词、学问之外,沈曾植涉猎甚广,正如钱仲联先生在《沈曾植集校注·自序》中所言的那样:“公余事多能,殚精评鉴,游心艺圃,放意墨林。翻谱录于宣和,承笔谈于历下。”

虹月沧江之舫,云林清之居。玉轴标华,金壶征故。考利州之帖,订误于覃溪,哥岩山之碑,折中于东观。”<sup>[1]2</sup>由此可见,沈曾植十分热衷于碑帖的度藏考证、评鉴题跋。事实上,沈曾植书翰高逸、收藏巨富、题跋甚多,其中《海日楼题跋》是比较系统反映其金石碑帖收藏的著作。《海日楼题跋》共有跋文269题,480余篇,原名《寐叟题跋》,在1926年之前由商务印书馆影印行世。从跋文内容来看,《海日楼题跋》所跋之物,并非全是沈氏收藏,其中也不乏寓目之物,但是大体上能够反映沈曾植金石碑帖收藏的来源、数量、品相、价值以及沈氏关于书画艺术及碑帖度藏的精辟见解。

## 一、藏品来源

沈曾植虽然没像同里的朱彝尊、僧六舟那样四处访帖拓碑,但其碑帖收藏数量也十分惊人。据笔者不完全统计,沈氏所收藏的名品碑帖就不下数百种,有些藏品还不止一件。例如,他在跋《万历宫铭》时言“平生虽屡见旧拓”,在跋写《覆刻安本书谱》时言“余藏《书谱》数本,惟此册篋行相随,舟车无间,盖余年于兹矣”,<sup>[2]95</sup>由此可见,沈曾植仅所藏的孙过庭小草《书谱》的刻本就有数本。沈曾植所藏的《曹恪碑》《礼器碑》《葛祚君碑》等汉代名碑之拓本也均不止数本。

**作者简介:**逢淑美(1989-),女,山东潍坊人,嘉兴学院图书馆馆员,研究方向为地方文化和阅读推广;杨刚(1987-),男,山东滕州人,嘉兴学院设计学院讲师,研究方向为书法艺术。

他所收藏的《兰亭》更是多样、多种、多版本,如东阳本、降帖本、秘阁本、开皇本、玉枕本、定五本、明刻褚临本、三希堂本、天一阁神龙本等无不囊括。再加上许多并未加题跋的藏品,沈氏碑帖收藏数量之巨是可以断想的。如此多的碑帖,其来源当然也是多种多样的。通过翻阅《海日楼题跋》《沈曾植集校注》,大致可将其归结为三大类,即:承袭家传、收罗购求和友人馈赠等。

沈曾植出生于书香门第,沈家世代对金石、书画、碑帖的收藏都十分重视,家传藏品自然不在少数。曾植祖父沈维鏞,为嘉庆七年(1802)进士,酷爱藏书,“排签插架,坐拥百城”,网罗了不少名人书画和名碑名拓。例如,《玉虹楼帖》当是沈家旧藏,沈曾植在《墨池玉屑本跋》中言“此《玉虹》临本,余卯角时所习。甲子沧桑,万事都尽,此数叶不意犹在,乃装诸此册中”,<sup>[2115]</sup>可见,《玉虹楼帖》对于沈曾植的一生影响至深。沈家所藏刻本《灵飞经》,被公认为是嘉兴众藏家所藏最善之本,在沈家家道中落时被变卖,幼年时期沈曾植引为终身之恨,以至于30余年不能释怀。

晚年在《明初拓〈灵飞经〉跋》中依然对于此事耿耿于怀。他在跋文中写道:“往在京都,钱徐山先生尝语余:警石老人晚岁评赏石刻,遍览禾中故家小楷名帖,于《灵飞》必称沈家本第一。当时徐山丈、沈雒宜、蒋寅舫、张叔未先生各出所藏以相较,无能颀颀者。帖后先水部公携至京邸,散叶未装,拓工精绝,锋芒纤丽,不异手书。墨华濡润如宋拓。余幼时犹见之,记其神采,宛在目前。丁卯、戊辰之间,质米于估家,才朱提三十铢耳!思之痛心。”又言“三十年来,遍访人间,曾无得其仿佛者。”<sup>[2187]</sup>再如沈曾植所藏的《王禹卿秋日登文游台诗卷》乃是其叔父所赠。他在跋文中写道:“叔父乃留金卷,而以此卷赐植。藏诸篋衍,迄癸卯乃付装池,去游粤时二十六年矣。”<sup>[21123]</sup>

沈曾植不但承袭了祖上所藏,而且还将这些名贵的藏品转赠给子孙,希望他们能够世代承袭,并且能够从这些拓本中有所得悟,书艺精进。例如,他在《宋拓阁帖跋》(二篇)中写道:“丁巳四月,护儿二十岁生日,检此赐之。楷法入手从唐碑,行草入手从晋帖,立此以为定则,而后可以上窥秦汉,下周近世,有本有文,折衷众说耳。”<sup>[2198-99]</sup>

经历了清初访碑和乾嘉考据之后,清末艺坛大有碑学一统之势,故而清末书家多有碑帖收聚之癖。沈曾植一生不论南下北上,还是东进西出,所到之处都不忘网罗金石碑帖。上海、嘉兴、南昌、北京、扬州、广州等地,都留下了其收求碑帖的身影。沈氏购买金石碑帖的途径很广,有些藏品购于厂肆,有些藏品直接来源于帖估,有些则是从朋友处购得。沈曾植藏有东阳本《兰亭叙》,此本拓工精美,品相一流,沈氏将其定为宋拓,视为稀世之珍。这本沈曾植所谓的宋拓《兰亭》即是得之于厂肆,他在跋文中记述得非常清楚:“光绪癸卯春,得此本于厂肆。”沈氏厂肆所得不仅有名帖,也有名碑,如其在《礼器碑跋》(二篇)中写道:“此覆本,出吴下,不知其祖自何氏……光绪己亥,过广陵,偶以番饼一元得此,视都中金题玉躐,贵人炫为宋拓者,为豚蹄而得沟车矣。”<sup>[2145]</sup>

沈氏在长期的碑帖收藏过程中,结识了很多碑估,并且与这些贩卖碑帖的商人建立了很好的友谊。由于长期的生意往来,碑估们甚至愿意将碑帖廉价卖与沈氏。沈曾植在《明拓礼器碑跋》中言:“此本得之厂肆澄清阁常卖杜生。杜,冀州人,父子、叔侄皆碑估,鉴别碑版,所持皆乾、嘉以来旧说也。李三老、王廉生皆喜之。”

生所得善本,价昂者归廉生,价廉归余,知余贫,无巨力也。此本直(值)白金一两,生固识为明拓,不欺余。”<sup>[2146]</sup>正如沈曾植所言,由于自己财无巨力,常常错过很多名碑名帖,他在题跋中也常常引以为恨。例如,沈曾植在《汉景君碑跋》中言道:“甲寅秋,罗子静携示刘铁云藏帖数十种,中有此碑(《汉景君碑》),是唐鹤安所藏,曾校覃溪藏本,号为明初拓本者,取以相校,完损略同,而拓功此尤较胜,欲购而价昂不可得,乃录唐跋于此。”<sup>[2147]</sup>他在《停云馆晋唐小字卷跋》文中言道:“宣统辛亥八月,王跋以十元为余购入。”

售者颇居奇,余则以旧物日希,此尤是以万历以前拓本,不忍舍之。”<sup>[2157]</sup>沈曾植的旧藏中有明拓《郁冈斋墨妙》,沈氏在跋文中言:“虚舟先生(王澐)旧藏也,有印识惜无题字。光绪戊申,得之舒州市上,已而亡第八一册。”<sup>[2180]</sup>他在《潭本十七帖跋》中言:“近日殊罕觐,此帖于汲中得之,固知北方多未经著录佳品。”<sup>[2180-81]</sup>同样得之于汲中的还有《右军书〈道德经〉》,沈曾植在跋文中言:“此本得之汲中,观此二印,则固玉雨堂旧物也。”<sup>[2184]</sup>

由于长期侵染于金石碑帖的收藏之中，沈曾植也结识了不少同好之友。沈曾植也有不少藏品为其藏界好友所赠，如汉碑《石门颂》拓本，即是好友沈维裕（益甫）旧藏，沈维裕谢世之后，该拓为曾植所得。沈氏在《石门颂碑跋》中写道：“此故友沈君益甫所藏，君归道山，帖遂留余斋。光绪丙申，为写书人盗鬻诸肆，辗转追求，乃复得之。戊春南归，幸置行笈，免为劫灰之烬。”<sup>[2]45</sup>再如，《魏上尊号碑》拓本，本是宝应朱文定家之旧藏，后为沈氏所得；《葛祚君碑》也是友人所惠赠。事实上，沈曾植所藏的《葛祚君碑》并非只有一本。他在跋文中写道：“昔有《葛祚君碑》，金陵陈氏独抱庐物也。”又言：“今陈本已失，犹藉此本摩挲，梦想孙、吴楷法，是问老惠我也。”<sup>[2]48</sup>沈曾植还有《王筠林重摹唐荆川家本十三行》，此乃其好友鲍少云的藏品，后赠与曾植。他在跋文中写道：“亡友鲍少云得《元公姬氏志》于都下，册后附此《十三行》二页。余视之曰：此唐荆川家本也。摹在何时？精采乃尔！少云遂辍以赠。”<sup>[2]77</sup>沈曾植所藏的《圣教序》拓本，乃是其好友谢金銮所赠送。他在《同州圣教序跋》中言及了此事：“同州《圣教序》，余得万历年旧本，模糊至不可耐。及谢退谷以新拓一本遗余，毡蜡继佳，字尤清楚，胜旧本数倍。”<sup>[2]90</sup>

## 二、藏品研究

沈曾植精通金石考据之学，同时是有清一代少有的书法大家，他对金石碑帖的收藏并非简单的占有，对碑版、法帖、墨迹多有考证、校勘、辨伪、评鹭。沈氏早年精于帖学，得法于包世臣，后学于张裕钊，晚年融碑化帖，开派立宗，因此，沈氏的碑帖、题跋与研究往往持论精微、擘肌分理。

沈曾植在《汉校官碑跋》中写道：“余最喜此碑书法，以为汉季隶篆沟通，《国山》、《天发》之前河也。愿恨拓本漫漶，尝集浓淡干湿数本合装之，互征其趣。”<sup>[2]46</sup>《校官碑》刊立于东汉光和四年（181），是东汉末期重要的书法石刻之一，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，被公认为是汉代隶书石刻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。沈曾植言是碑“隶篆沟通”，开《国山碑》和《天发神谶碑》之先河，可谓一语道破天机。此碑从书体的角度来看介于篆隶之间，这种现象在众多的东汉碑刻中确实较为少见。众所周知，隶书发轫于春秋战国，成熟于秦汉易代。西汉之初，由于书体演变的原因篆隶相参较为普遍，随着隶书的逐渐成熟，到东汉立国之后这种“篆隶沟通”的碑刻已极为罕见。《校官碑》虽刊于东汉末年，却颇有古风，因此更显高古绝俗，卓而不群。从书风的角度来看，该碑用笔圆厚，结构整饬，布局茂密，对《国山碑》《孔羨碑》《天发神谶碑》一路的书法风格确有先导之功，以至于清人方朔跋其曰：“有西京（指西汉）篆初变隶风范。”<sup>[3]27</sup>杨守敬评其“方正古厚，已导《孔羨》之先路”。<sup>[3]27</sup>沈曾植偏爱此碑，对其评价虽然简短但切中要害，又与杨守敬、方朔等人的艺术史观不谋而合，足见沈氏在碑帖鉴赏方面独具的美学慧眼和艺术洞察力。

沈曾植推重北朝书风，但与康有为、何绍基等人相比，并不盲目夸大北碑之美，而是更加注重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。例如，他在《敬使君碑跋》时言：“此碑运锋结字，具有与《定武兰亭》可相证发者。东魏书人，始变隶风，渐传南法，风尚所趋，正与文家温、魏向任、沈集中作贼不异。”<sup>[2]51</sup>很显然，沈曾植已经关注到了东西魏时期南北书风的融合与碰撞，并且明确地指出了北碑向南朝书风学习借鉴的史实。沈曾植以发展运动的眼光看待书风的演进和变迁，这种书法史观在其他的碑跋文中也较为常见。例如，他在《高湛墓志跋》中写道：“大抵北朝书法，亦是因时变易，正光以前为一种，最古劲；天平以下为一种，稍平易；齐末为一种，风格视永徽相上下，古隶相传之法，无复存矣。”<sup>[2]50</sup>又如，他在《多宝塔碑》《李绅龙宫寺碑》等跋文中阐述唐代碑刻源流之变化和风尚之体变莫不精当。

沈曾植在《郁冈斋墨妙萧子云书月仪帖跋》（八篇）中尝考证。沈氏言：“二月章时赞宜旧释作及时，窃疑当释作与时，急就与字两所见，均作，省变所由不可识，为传刻舛误无疑。若依此作，则八分与相近，而后来草书家与作，亦可得其所出矣。于与亦不相似，又从省耳。七月章与子少旧可证。”<sup>[2]88</sup>不仅考证了《月仪帖》的释文，并且对其真伪有所辨正。沈氏言：“王筠林不信《月仪》。谓其文不类六代。”沈氏则根据《昭明集》有《十二月锦带书》，其体即《月仪》之类，以及《征西》书语义质古，为汉、魏间人语，以及《太平御览》书目有王羲之《月仪书》等，认为《月仪帖》为真。并且沈曾植还根据《月仪帖》的笔势与《夏承碑》相似，认为《月仪》一帖得汉人遗风，应该是出自汉末人之手。从而得出结论，认为索靖的《月仪帖》不论是在文风还是在书风上都应该不是后人所伪造。

沈曾植十分擅长利用同一时期的碑刻来比较书风之高下，用同一碑刻的不同版本来比勘拓本之优劣。例如，他在跋《崔敬邕

墓志》时言：“此志用笔略近《李超》，尚不及《刁惠公》之茂密。”又言：“近江南任氏得李眉生藏本双钩一本，刻行细意相校，殊无大异。彼本弥近《李超》，清润处复与《司马景和妻》相近。然则原刻度当似《崔颢》，非《刁惠公》一种也。”<sup>[2]48</sup>沈曾植又在《十三行跋》（二篇）文中道：“戊申腊月，用闽李氏所藏宋本校一过，乃弥见此本之佳。”<sup>[2]76</sup>他在《十三行跋》文中言：“丙辰中伏，雨后微凉，以筠清馆所藏宋拓玉版《十三行》比勘一过，纤毫不易。”并引用蔡生甫之跋语：“此的是秋壑原刻。近又得葛岭初出拓，比勘不爽毫发。”<sup>[2]76</sup>可见，沈曾植十分重视版本的校勘工作。沈氏在《心太平本黄庭坚跋》中写道：“近得同治拓本刻有吴平斋跋者，持用相校，乃知竟是旧拓。”<sup>[2]86</sup>还在《圣教序跋为谢复园题》中，根据拓本存字多寡，来考证拓本年代。他在文中言道：“《圣教》以三奥俱全故得阿耨多罗故字未损者，为断后旧拓本之证。断在明前，则具此二证者，亦在明前矣。”<sup>[2]89</sup>沈氏还利用拓本与文献记载相比勘，来确定拓本的真伪与年代。例如，他在《南宋覆刻大观帖跋》中言：“此卷叙次，与《石刻铺叙》一一相符，题目官阶，亦无不合者。惟谢万书题目残缺，而存一傅字，为可疑耳。此当为翻刻之证。顾氏释文所称《大观》摹证各证，亦皆吻合。宋讳缺笔均同。”<sup>[2]97</sup>

在碑帖的题跋中，沈曾植还时常评鹭书艺高下。例如，他在跋《张猛龙碑》时言：“此碑风力危峭，奄有钟、梁胜境，而终幅不杂一分笔，与北碑他刻纵意抒写者不同。书人名氏虽湮，度其下笔之时，固自有斟酌古今意度。此直当为由分入楷第一巨制，拟之分家，则中郎《石经》已。碑字大小略殊，当于大处观其轩豁，小处识其沉至。”<sup>[2]49</sup>

### 三、藏家交往

沈曾植在日常生活中留心碑帖，但凡有价值的书法石刻，或摹写或记录，乐此不疲。例如，他在《国学本定武兰亭跋》文中言：“辛丑七月见一宋拓定武本，有王俨斋、徐坛长印记，纸墨古，的为六、七百年旧物。揭曼硕、吾子行题记俱真。然是国学旧拓之最精者耳。因摹其题记于此。”<sup>[2]66</sup>收藏之余，沈曾植还与许多碑帖藏家交往过密，诸如裴伯谦、宝瑞臣、谢复园、王懿荣、罗振玉、吴郁生、章士钊、金兆蕃等无不在其交游之列。他们的交往大多以碑帖的鉴藏与题跋活动为重要的媒介。在与这些藏家、学人切磋学问、探讨艺术的过程中，沈曾植开拓了艺术眼界，提升了赏鉴能力，同时也留下了不少颇具精深之论的跋文。

如前所述沈氏的跋文也不乏寓目之作。例如，沈曾植在跋《宋拓秘阁本兰亭》时即明言“借置斋中十余日，以余所蓄《秘阁》本校之正同”<sup>[2]63</sup>，其《三希堂本兰亭叙跋》也是为寓目之作所跋，文中言“原本在裴伯谦家。光绪甲辰在南昌借观一日，略记其异同于上方，不能尽也”<sup>[2]68</sup>。《兰亭集珍七种》也是裴伯谦家所藏，沈氏也曾借观，并有跋文。沈氏在跋文中写道“赵子固落水本，今在裴伯谦家。丙午夏，曾得一观”；“退谷本在今临川李氏，甲寅冬得假观”<sup>[2]68-69</sup>云云。光绪丙午（1906），沈曾植曾借郑观察所收吴荷屋藏《博古堂帖三种》用以校勘。光绪戊申（1908）腊月，沈曾植用闽李氏所藏宋本《十三行》校勘自藏《武陵帖》本《十三行》等。当然，沈曾植也经常将自己的藏品借给好友。例如，他在《宝晋斋法帖跋》中言道：“宝瑞臣极爱此帖，每过斋头，必索观，尝借去，经数月乃还。”<sup>[2]80</sup>沈氏在晚年回想起二人同好书画收藏的经历感慨万千：“旧游如梦，忆及，偶记。”<sup>[2]80</sup>再如，沈曾植的《同州圣教序》也曾借给好友宝瑞臣。他在《同州圣教序跋》中言“庚子梦秋客沪渎，市上购此。余旧有明拓本，戊戌春仲出都，为宝瑞臣编修借去，未携以出”<sup>[2]93</sup>云云。

沈曾植精于碑帖鉴定，同时又是海内少有的书法名家。沈氏一跋，碑帖身价顿时大增，凡经沈氏眼目为善本者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差池，因此向沈氏索跋者甚众。例如，《海日楼题跋》中的《多宝塔跋》《圣教序跋》等即是为谢复园所题，《姚文献公碑跋》是为友人王懿荣所跋。在沈曾植的诗集中也留存有不少为他人藏品撰写的跋文诗，如《题刘健之宋拓蜀石经春秋左氏传册》《文信国与府理刘子墨迹前有画像》《题黄忠端公尺牍》等都是沈氏为他人跋。《文信国与府理刘子墨迹前有画像》，按陈三立《散原精舍诗续集》题云：“王编修泽寰，偕族人，笃余明经，自庐陵游江南携示文信国画像及手札墨迹，谨题其后。”<sup>[1]117</sup>可见，这些文天祥的墨迹和画像都是王泽寰的藏品。再如，沈曾植的《题黄忠端公尺牍》在自注中言：“拔可观察新得此册，遂为沪上黄书第一，留余斋中几两月矣。东洲、石洲两跋详尽，几无后人着笔地，姑摭畸眷成六绝句以应其请。”<sup>[1]1340</sup>《沈曾植集校注》中存其六绝句。沈氏对该尺牍书法大加激赏，评其：“笔精政尔参钟索，虞柳拟焉将不伦。微至只应鸿宝会，拟山园帖尔何人。”<sup>[1]1342</sup>

沈曾植的碑帖题跋颇多，名气日高，金石收藏大家王懿荣、吴郁生、章士钊、金兆蕃都时常请跋于沈氏。沈曾植《姚文献公

碑题诗》即为王懿荣请沈氏所跋。沈曾植在跋文中写道：“廉生蓄此碑旧拓，笔意兼中令兰台之长，对此乃如摇落江潭，追想风流可爱时也。”<sup>[1]</sup><sup>1314</sup> 沈曾植有《题钝斋所藏旧拓龙藏寺碑》乃是为吴郁生所跋：“龙藏谁所书，昔疑王孝逸。关东二王法，名与文深匹。学自文中受，书从篆蒙述。观其锋势郁，乐毅伊同术。尚戛习子敬，乃得右军律。中锋紫篆引，破体错分勒。筋力擢虞陆，肉采资褚薛。相彼杨花飞，已征李子结。南风竟北吹，兹见同书实……”<sup>[1]</sup><sup>1395-1296</sup> 沈曾植在诗中对《龙藏寺碑》的书风大加激赏。《沈曾植集》中的《为章行严题旧馆坛碑》是为章士钊所跋。沈曾植对此碑也评价甚高，言其“参取吴兴儿骨峭，入山帖尚在文家”，乃是化用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之语：“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，形状虽未成长，而骨体甚峭快”。<sup>[4]</sup>同时，沈曾植在《茵阁琐谈》中评鹭《旧馆坛碑》言：“旧馆坛碑宋拓本，义门见之而莫能形容其美，字形虽小，意其拓本锋颖已秃，笔意不可得而寻绎乎？以《入山帖》倒之，当以峻削收敛为宗趣。”<sup>[1]</sup><sup>1294</sup>

## 四、藏品价值

由于有些原碑、原石被毁，仅存的原拓本或孤本就会价值连城。据史料记载，北宋黄庭坚曾有记《孔庙碑》的“贞观刻”，当时就是他以千两黄金所购得。1920年，罗振玉公开出售由他鉴定的明拓本《西安本庙堂碑》，价值140块大洋。当然，碑帖的价值不能仅用金钱来衡量，其文化、文献、艺术价值更重要。

沈曾植的藏品大多品相上乘。在他的藏品中，既有年代久远的宋拓，也有海内公认的孤品；既有名家之真迹，也不乏传世之名刻。2018年，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《金石书画（第三卷）》中有《海日楼旧藏碑帖专题》，选刊了浙江省博物馆藏沈氏拓本52种，上海图书馆藏沈氏拓本5种，嘉兴博物馆藏沈氏拓本1种，共计58种，基本上可以窥探沈氏碑帖度藏之风貌。在这些沈曾植的旧藏中，名帖有钟繇《宣示表》、王献之《洛神赋》及《淳化阁帖》（明拓）、《澄清堂帖》《真赏斋帖》《停云馆帖》《至宝斋法帖》《快雪堂法书》《玉虹楼帖》等，几乎涵盖了历代名帖之精品。名碑则有曹魏《皇女墓记》（罗振玉赠并跋）、北魏《张安姬墓志》（罗振玉赠并跋）、北魏《刁遵墓志》、东魏《高湛墓志》、旧拓唐《昭仁寺碑》、旧拓唐《李靖碑》及《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》《文林郎爨君墓志》《大证禅师碑》等。有些极为罕见，有些为名家旧藏或赠送。沈曾植所藏的《贾使君碑》，可以算是少有的旧拓珍品。他在《贾使君碑跋》中写道：“此本在余斋中三十余年，珍为明拓，固未尝有他拓相比较也。近日王氏所藏吴让老题本号为明初拓者，即持以勘，尚在此下。”<sup>[2]</sup><sup>48</sup>

据沈曾植《海日楼题跋》记载，其所藏之名帖中被定为宋拓者有《宋拓东阳本兰亭序》《宋拓降帖本兰亭序》《宋拓秘阁本兰亭序》《宋拓禊帖九种》《十三行》《乐毅论》《修内司本十七帖》《黄庭经》《寿光本圣教序》《南宋拓本圣教序》《书谱》《褚登善哀册》《大观帖》《淳化阁帖》《泉帖》《降帖》等数十种。颇值得注意的是，沈曾植所藏南宋拓《姑孰残帖》、初拓隋《宁贲碑》、明拓唐《圭峰定慧禅师碑》等，从版本角度看，均应列入善本。尤其是南宋拓《姑孰残帖》，刻于南宋淳熙年间，全帖未见著录，海日楼旧藏是册，凡十五开，包括陆游、苏轼、苏舜钦三家作品，咸丰年间，由樊彬在京城厂肆中购得，民国初年归沈曾植。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，为国家一级文物，并已被收入第一批“国家珍贵古籍名录”，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。

综上所述，沈曾植的碑帖鉴藏与题跋，是其治学和艺术活动的知见录，从中可以窥探到沈曾植的一些思想倾向和治学方法。沈曾植的书法艺术与碑帖收藏互为条件、互相促进，为其晚年书学观念与书风的变革指明了方向，为其成为一代碑学大家奠定了基础。

### 参考文献：

[1] 钱仲联. 沈曾植集校注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1.

[2] 沈曾植. 海日楼题跋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9.

[3] 高山流水. 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《汉校官碑》拓本初探[J]. 北京文博, 2019(2): 27-35.

---

[4] 崔尔平. 历代书法论文选[M]. 上海:上海书画出版社, 2006:82.